· 史学研究 ·

解放战争时期政治生态与 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最终确立

杨宁, 刘晓明

(南京政治学院政治理论|系, 江苏南京 210003)

摘要: 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最终确立执政地位的重要时期和关键阶段, 解放战争这|特殊历史时期政治生态的变化演进, 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这|科学论断。

关键词: 解放战争; 中国共产党; 执政地位

中图分类号: D23; K2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9774(2011)01-0067-05

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 给中国的政治发展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中国战后的政治走向, “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 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1〕130}中国历史的发展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1949年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由局部范围执政转向全国范围执政, 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人民解放战争之于中国及中国共产党的意义, 不仅在于它是中国历史、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关键阶段, 还在于它预示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时代已经到来、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地位的最终确立。本文旨在通过对解放战争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政治生态变化的推演, 进一步加深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是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这一科学论断的理解和把握。

恩格斯指出: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 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 而其中每一个意志, 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

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 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 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 即历史结果, 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 的产物。”^{〔2〕67}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因此, “历史结果”最终表现为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选择。从现代政治生态学的角度来看, 人民的选择不单意味着人民对一定政治系统的认同、服从和参与, 意味着人民“对统治权利的承认”^{〔3〕12}, 而且意味着政治系统具有了“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4〕35}。然而,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 却并不存在这样一种被人们普遍承认的统治权利, 其深层原因在于: 无论国民党统治的国统区还是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 实行的各项制度都具有突出的战时特征, 使民众产生和坚持现存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能力的政治系统并不存在。

事实上, 抗战结束后, 国内政治生态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 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状况已远非战前和战时堪比, 共产党和国民党已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两大政党。一方面, 这一时期的国民党政权在国内外获得了一定的声望, 甚至有论者认为“那短暂

收稿日期: 2010-11-22

作者简介: 杨宁, 南京政治学院政治理论|系政治学教研室副教授, 政治学博士。

刘晓明, 南京政治学院政治理论|系硕士生。

的时期是国民党政权黄金时期的顶峰”^{〔5〕13}。在国内，国统区得到了空前的统一，国民党手握军队四百多万，坐拥占据绝对优势的国家资源；在国际上，国民党中国享有世界五强之名，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而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也远超昔日，共产党“在国内政治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已经不是一九二七年时候的情况了，也不是一九三七年时候的情况了。国民党从来不肯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现在也只好承认了”^{〔1〕158}。“抗日战争胜利时，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有一百二十多万党员的大党，抗日根据地的面积达到近一百万平方公里，人口近一亿人，人民军队发展到一百二十余万人，民兵发展到二百二十万人。国民党统治区内由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组成的民主力量有很大增强，并同共产党建立了密切联系。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和比重，同抗战初期大不相同了”^{〔6〕203}。因此，抗战结束后中国社会政治生态的现实状况表明：国共两党实力对比的变化，已经决定了国民党政府想单方面垄断抗日战争胜利果实的企图难以实现；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经过艰苦的斗争虽然也得到一部分抗战胜利果实，“但还不可能使抗日战争的胜利完全成为人民的胜利”^{〔6〕204}。

抗日战争后的国内政治生态，决定了国共两党任何一方都无力单独成为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主宰，国共两党也没有任何一方有资格以单独领导抗战胜利的功劳，把党派利益凌驾于人民的利益之上。“当国家前途处于重新选择，占有主要权力资源的政治集团在实力上难分伯仲之际，在社会底层就会形成自发性的政治参与浪潮。被战争所动员起来的社会各阶层、各利益群体在战后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政见，干预国事”^{〔7〕382}。胡绳认为，在国共两党之间存在着一个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间势力”。“就阶级属性说他们是革命的，就具体的人说，他们当中大多数在政治上是处于中间状态。可以跟共产党走，也可以跟国民党走”^{〔5〕4}，建立联合政府已成为各种中间势力共同的政治要求和目标。事实上，早在抗战结束前的1944年，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和建立联合政府已成为人们的共同愿景。作为国共之外的第三大党，中国民主同盟则在1944年10月10日发表了《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要求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联合政府，实行民主政治。同盟国的胜利也使战后国际社会出现了持续高涨的民主浪潮，杜鲁门和斯大林都不希望战后出现一个分裂的中国，一致期待能够产

生一个国共合作的联合政府，美苏通过各种方式向中国传达了这一信息。可以说，这一时期，国共双方“都感到了一定的压力。从战场转移到政治舞台的某种联合可以不过分损伤实力而补偿弱点，这至少是可以想象的。就是由于这种动摇而含糊的理由，在中国，和平的希望才在熄灭前短暂地闪烁过”^{〔8〕15}。在这种特定的国内国际政治背景下，抗日战争结束后的特殊政治生态，使中国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与争取和平建国的愿望触手可及。

二

1945年4月至6月间，共产党和国民党先后召开了各自的全国代表大会，两党都在为抗战胜利后的政治进程进行规划，都在准备迎接抗战胜利后的新任务。“一九四五年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建党以后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那次代表大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9〕1-2}。如果说一定的政治生态会影响政治主体的活动，那么政治主体的活动同样也对政治生态起着改造作用。一定意义上，任何社会政治进程的发展都是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中进行的。事实上，抗战结束后，国共两党作为占有中国主要政治资源的两大政治集团，其活动影响并推动了中国的政治进程。

抗战结束后，争取通过和平道路来建设一个新中国，逐步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加快发展中国的民族经济，已经成为战后中国人民从社会各民主政团、党派和上层民主人士，到一般劳苦大众的普遍愿望。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遭受的巨大苦难，让人民无论是从感性上还是理性上都希望立刻结束长期以来的战乱而无法接受继续战争。避免内战、争取和平，成为考量国共两党人心向背的一项根本指标。对比国民党六大和共产党七大，国民党把消灭共产党作为完成战后建国任务的条件，1945年5月，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大上毫无顾忌地提出：“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10〕38}。而共产党则再次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口号。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和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鲜明地反映出共产党对抗战胜利后国内政治形势的清醒估计，集中代表了全中国人民的根本愿望和利益。两相比较，谁的主张更符合公道人心，一目了然。卢梭曾经说过，即使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得足以永远

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1〕12}。所谓民意难违就是这个道理。部分地也是基于这一原因，加之国际因素和军事准备等诸多方面的考虑，蒋介石当时对冒天下之大不韪，立刻发动内战也还是有所顾忌的。

军事是政治的继续。政治生态作为一个系统，从来就不可能孤立地独自存在，它必然受到诸如军事、外交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从政治生态的视角来看，军事实力和政治实力并不是简单的正比关系，军事上的强势不能必然地带来政治上的优势。事实上，当时国民党不仅在政治上有所顾忌，即使在军事上，由于其精锐部队在抗战期间大多部署于西南和西北地区，要迅速开赴华北和华东也有很大的难度，东北更是鞭长莫及，一时还难以立刻发动内战。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开始上演了一出以和谈为幌子，以“假和平、真内战”为目的的政治秀。蒋介石向延安连续发出三次电报，主动邀请毛泽东去重庆共商团结建国大计。蒋介石打算通过“和谈”政治烟幕的掩饰和拖延，加紧内战部署，又企图通过这样的政治伎俩，把将来内战的责任全部推到共产党身上。由于抱着“假和平、真内战”的目的，决定了国民党的政治秀无疑是自欺欺人，因为其和平的承诺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谎言，通过发动内战的手段达到独裁统治才是蒋介石的真正目的。

重庆谈判固然为国民党的内战部署争得了时间，但同时也使全国人民进一步看清楚了国民党的真实面目。“在 1945—1946 年的和谈期间，共产党人在赢得舆论的对比方面，已获得成功。人们普遍相信，共产党人是诚心诚意的，例如在 1946 年 1 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当时他们为了避免全面战争，同意作出几项妥协。而当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数星期后单方面撕毁了几项政协协定时，政府便在这场较量中失去了信任”^{〔12〕83}。

与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做法相反，中国共产党不仅对争取和平有着真诚的愿望，而且已经做好了争取和平的准备。1945 年 8 月 25 日晚，中国共产党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共商团结建国大计。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28 日，毛泽东偕同周恩来、王若飞，从延安乘专机赴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毛泽东亲赴重庆，不仅击破了国民党鼓吹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也使更多的人进一步认清了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的真诚愿望，粉碎了国民党推卸内战责任的阴谋。两相对比，国民党上演的这出丑陋的政治秀固然为他们发动内战骗得了一点时间，

但也为之付出了失去民心的惨重代价。

三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与共产党相比，军事实力明显占优，但在政治上却并无优势可言，特别是国民党一意孤行的内战政策使其逐渐失去了民心，成为在政治上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其在抗日战争中所积累的政治资本也渐渐丧失殆尽。1946 年国民党在占领华北解放区重要城市张家口之后，于 11 月 15 日拉拢两个小党派青年党和民社党以及部分社会名流，在南京召开制宪国大，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开始转入所谓“宪政”体制。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国民党绞尽脑汁使出的这一招其实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恰恰使它丧失了执政的政治基础。1946 年 1 月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政协决议规定：必须在全面停战的前提下，由各党派联合改组政府，随后由改组后的联合政府主持召开举国一致的国民大会，通过宪法，实施宪政。这是当时反对党反复强调和坚持的政协程序。然而，国民党撇开反对党，坚持由其未改组过的国民党一党政府单独召开国大，违背了政协决议。政协决议虽非法律文件，但在民众心目中却具有比法更大的权威性。因此，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以孤立我党和其他民主势力为目标而召开的蒋介石的非法的分裂的国民大会及其所制造的伪宪法，在人民面前没有任何威信。它们没有使我党和其他民主势力陷于孤立，反而使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自己孤立起来”^{〔1〕124}。可以说，国民党当局就在这一系列拙劣的政治表演中慢慢自毁执政资源。

然而，此时的国民党依然没有看清自身在政治上的弱点，反而以为仰仗其所拥有的远远大于中共的军事力量，就可以一意孤行，为所欲为。按照“双十协定”协议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原本给了国民党以可以缓和、甚至挽救政治败局的最后机会，但国民党挑起的全面内战，很快就让其在政治上的失败成为定局。

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几项协议有利于和平建国，因而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激起了民众对实现全国和平、民主、团结的共同期望。特别是由于协议较多地吸收了中间人士的意见，因此它也成为衡量国共两党执政基础的重要参照。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积极筹划部署内战的行为越来越让人们对其失望，而其对争取和平人士的暴力政策也让这些中间力量同它愈走愈远。国民党不愿放弃一党专政，不能承受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其结果必然是招致民心与它渐行渐远、反与共产党日益靠近。发生

在 1946 年 6 月份的一件小事就充分昭示了这样的趋势。彼时，人民团体联合会组成包括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宗教界等社会团体知名人士的请愿团，赴南京向国民党当局呼吁和平。当请愿团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竟遭国民党当局指使的大批暴徒围攻长达 5 个小时，团长马叙伦和多名代表身受重伤。中共代表团周恩来亲自赶赴医院慰问，马叙伦表示“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显然，此时国民党当局已经失去了人民的信任。民盟亦改变其在国共之间所保持的“不偏不倚的态度”。到 1948 年，民盟与其他一些民主党派在国民党反动当局的迫害下，流亡到香港恢复组织，发表声明，公开宣布与国民党决裂，放弃“中间路线”，转而支持中共的武装革命。这正如许纪霖先生所概括的：“1947 年 7 月，国民政府发布《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与共产党正式决裂。战后重建政治共同体的和平努力彻底失败了。虽然此时国共两党在军事上胜负未明，但在两年的政治较量中，国民党已打了一个大败仗。这就注定了其 1949 年的命运归宿”^{[7]3586}。

然而，政治上的失败尚不足以使国民党马上垮台，同样，政治上的胜利也无法使共产党立刻实现由局部执政到全国范围内执政的跨越。“毛所争取的是人民的支持，蒋所重视的以军队为主”^{[13]727}，国民党强大的军事力量始终是其敢于一再违背民意的资本。进而言之，国民党当时不仅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军事实力，而且无法意识到政治优势是军事优势“倍增器”的道理。蒋介石甚至声称，他倚仗国民党的军事优势，如果配合得法，运用灵活，就一定能速战速决。事实上，“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只是暂时的现象，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也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蒋介石战争的反人民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这方面，人民解放军则占着优势”^{[1]1246}。战事的发展进程完全打破了国民党的如意算盘，到 1947 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就结束了战略防御阶段，6 月 30 日夜，刘邓大军十二万人以出人意料的突然行动，一举突破黄河天险，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在共产党“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中，解放战争于 1948 年秋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携三大战役胜利之勇，1949 年 4 月 23 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国民党政权的覆灭。

四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

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这是新中国开国之初，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的碑文。民族独立是中国近代史的主题之一，国民党和共产党在立党之初及其以后的奋斗过程中，都面临着争取与实现民族解放的要求和压力。孙中山先生曾说过，“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前者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后者要求“国内诸民族宜可得平等之结合”^{[14]525}。上述两方面的意义对于中国共产党亦然。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确立的历史必然性是和其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责任与担当联系在一起。在这个问题上，即使是西方学者也认同这个基本论断。美国学者汤森在其著作《中国政治》中就曾说过，中国共产党在战争期间所争得的源于民族主义的合法性，对于走向胜利、吸引大众支持和让反对势力保持中立，都是必不可少的^{[15]12}。

“民族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推动力’，作为一种整合的主题，它以国家振兴的观念将各种目标联合在一起。它最明确的表述可以说是要求国家独立，不受外国的影响和控制”^{[17]34}。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是一个极其重大而且敏感的问题。驱逐西方势力，收回主权是全民的愿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族问题是中国近代以来鉴别和检验一切政治势力和党派的试金石。能否在民族解放和独立问题上有所作为，成为人们评价中国各政党成败得失的一个重要标准，直接影响着中国政治生态的走向。尽管战后中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一直被外国欺凌的中国具有了世界大国的地位。但战后中国的大国地位其实是虚幻的，并不真实。美国背着中国与苏联秘密签订的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雅尔塔协议》就充分证明了中国的常任理事国地位在当时也不过是一个空头衔。当时国民党政权所推行的对外政策实质上是投靠列强，这在本质上损害了民族根本利益。尤其是在抗战胜利后，为了打内战，国民党一心投靠美国，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更是不得民心。正如毛泽东强调指出的：“蒋介石发动的战争，是一个在美帝国主义指挥之下的反对中国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的反革命的战争”^{[1]1245}。

解放战争期间，作为接受美国援助的外交条件，国民党当局同美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公开或秘密的

丧权辱国的条约或协定。凭借在中国取得的特权,美国商品在中国形成独占地位,在全部外国在华资本中美国就占到 80% 以上。这给中国民族经济带来了毁灭性打击,可以说,国统区已“形同美国的殖民地”。由于国民党政府的纵容,美军在中国到处横行,更激起了长期以来饱受帝国主义欺压的中国人民的极大民族愤怒。在这种背景下,国统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以“抗暴运动”为标志,以学生群众为先锋的爱国民主运动同国民党政府之间的斗争,逐步形成了配合解放战争进程的第二条战线。与国民党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相反,毛泽东提出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鲜明地表达了共产党的民族立场和争取民族独立的信心与决心。发生在解放战争中的一件小事生动地反映了共产党在民族问题上的正义立场。1949年4月20日、21日,当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作战的时候,侵入中国内河长江的英国“紫石英”号等4艘军舰先后驶向人民解放军防区,企图妨碍解放军渡江,中英双方遂发生激烈炮战,“紫石英”号被人民解放军击伤停搁在镇江江面,其余三艘英舰逃走。事后,英国政府竟然宣称:“英国军舰有合法权利在长江行使”,保守党领袖丘吉尔甚至主张派航空母舰到中国海上“实行武力报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立刻发表声明,严正指出:“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这个声明,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立场,使长期以来饱受帝国主义欺压的中国人民感到扬眉吐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变了中国的形象。凡是中华儿女,不管穿什么服装,不管是什么立场,起码都有中华民族的自豪感”^[9]。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屈辱史也随之烟消云散。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历史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

而历史的必然性只能在人们的自觉活动中。中国共产党人在自己的自觉行动中,牢牢把握住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在发挥主观能动性和把握客观规律性的统一中,实现了由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历史性转变。这种结果既非机遇垂青,更非偶然侥幸,而是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

(责任编辑 晓石)

参考文献:

- [1]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让·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 [4]S. M. 李普赛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 [5]胡绳.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 [6]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 [7]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
- [8]莱曼·P. 范斯莱克.马歇尔使华·绪言[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9]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0]程思远.政坛回忆[M].广西: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
- [11]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12]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 [13]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册[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2.
- [14]孙中山选集: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 [15]詹姆斯·R. 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Political Ecology in the War of Liberation and the Final Establishment of CPC's Position to Rule

Yang Ning Liu Xiaoming

Abstract The War of Liberation is a crucial period that actually established the CPC's position to rule the country. The change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s special period fully proved the scientific assertion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a choice by history and a choice by the people”.

Key words the War of Liberati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position to rule